

古代家训中的家国观念

□ 尹传政

古代家训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家庭教育的基本形式，其中就包含着礼仪、德育、为人处世等思想内容的教育，对整个家庭及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其中所蕴含的国家情感、心怀天下社稷的政德思想成为家训教育的最高境界。

古代家训始终把“家国一体”思想作为家庭政德教育的基本原则。家训文化就是对家庭成员进行的相关道德思想和为人处世的教育。纵览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家训对于“家国一体”的思想教育，从根本上传承着“家国不分”“为国为家”的中华文明精神的核心价值理念。可以说，历朝历代家训在提升个人品德基础上要求每位家庭成员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心。《颜氏家训》就教育子女要做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并提出了应当具备的条件，“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文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适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林则徐在家书中就表达了家与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如在《复郑夫人》中就讲到：“余抱此志，百折不回。来书谆嘱，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此虽保身保家之善谋，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意思是，我怀抱禁烟志向，不管遭遇什么困难都不会放弃。你来信谆谆嘱咐我有把握再行动，不硬做做不到的事情，这虽然是保护了自己和家庭的好计策，但却不是为臣奋不顾身的道理。在林则徐看来，禁烟攸关国家民族命运，“夫余生逢盛世，明智禁烟妨碍英夷大利，必有困难，而毅然决然，不敢稍存畏憚之心者，盖以身许国，但求福国利民，与民除害，自身生死且尚诸度外，毁誉更不计及也。”显然，林则徐为了禁烟，只要能为国为民，即使牺牲自己和败坏了自己的声誉，都在所不惜。

古代家训始终将“明大德”作为家庭政德教育的最高境界和追求。古代家训始终认为家庭教育担负着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是教化和培育家人具有天下情怀的一种重要



途径。因此，司马光在编辑家训《家范》时，在开篇就引用了《大学》的话，以强调其根本目的：“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颜氏家训》中的《勉学》篇就提到：“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而更为重要的是《颜氏家训》主张的学习目的是能够经世致用，于是它指出，“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能高谈虚论，左琴右书”，因为这样做必然不能实现治世平天下，“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意思是，如果整天只知道吟诗唱歌，谈笑戏谑，写诗作赋，悠闲自得，除多了一些迂腐荒诞的小技能，对于军国大事，治世理政，一点用处都没有。显然，从《颜氏家训》来看，个人修为提高的目的就要为了国家社稷，否则没有意义。

古代家训始终把“守公德”作为家庭政德教育的基本内容。所谓守公德，就是遵守社会的公序良俗，成为社会风气的表率。家训中更多的是教育子女做到“仁、义、礼、智、信”。其中，节俭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美德，备受历代家训的推崇。如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颜氏家训》则强调：“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

不恤之谓也。”《朱子家训》就强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以勤俭节约教育子孙后代，充分体现了古代家训勤俭持家的美好愿望和要求。而《家训》将节俭作为家庭生活美德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培养子孙为官从政后的廉洁。《袁氏世范》强调：“勤与俭，治生之道也。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寡入而妄费，则财匮，财匮则苟取，愚者为寡廉鲜耻之事，黠者入行险侥幸之途。”这样教育子女的根本目的就是避免做官从政以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古代家训始终把“严私德”的修身行为，作为实现利国、利民、为国、为民“公德”的基础。古代家训始终认为个人的修为事关他人、社会和国家。如爱而无教，害子害人，祸国殃民；爱而善教，育子成人，福国利民；要以义方训子，使之成人，以礼法齐家，使家和兴；只有每个成员的言行合礼，家庭才能和睦，家业才能兴旺，家人才能发达，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治家莫如治礼。”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写道：“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意思是人一奢侈，就会产生很多欲望。君子欲望多，就会

贪图荣华富贵，不走正道，招来祸害；普通人欲望一多，就四方钻营，肆意挥霍，致使家庭败亡，自身丧命。做官时，一定会受贿；做老百姓，必然会盗窃。所以说：“奢侈，是各种罪恶中最严重的。”而《颜氏家训》还要求子女要养成务实的品行，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社会干实事。“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意思是读书为官，修身处世，贵在有用于事和物，而不能只是高谈阔论、弹琴练字，白白浪费国家给予的俸禄官位。之所以在这里强调严私德，是因为在《颜氏家训》看来，“但知私财不入，公事夙办，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诚己刑物，执譬如组，反风灭火，化鸱为凤之术也。”意思是他们以为只要不谋私财，公事趁早办理，就可以说，“我也能治理百姓”；却不知道管好百姓，要以身作则，诚己正人，善于驾驭为官之道，熟练掌握救灾灭祸、教化百姓的本领。



汉宣帝中兴与整顿吏治（三）

□ 王志强

朝廷的行政事务涉及庞大的利益，操持事务的官吏在这巨大的利益面前很容易犯错误，因此需要对官吏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方法。汉宣帝励精理道，考核官员的主导方针是“听其言，察其行”，每当任命刺史、太守、国相等地方官员时，宣帝都亲自来考问他们，结合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判断他们的回答，这样就不容易被官吏的言语所欺骗和蒙蔽，“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名实是否一致，言行是否一致是汉宣帝考察官员的重要方法，如龚遂提出治理齐地的方法是“唯缓之，然后可治”，当宣帝发现龚遂用舒缓之法将齐地治理得井井有条时，就将其提拔为水衡都尉。宣帝综合名实的另外一个体现就是任人得当，不同才能的官员要在不同的职位上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才干，善于治理地方的官员不一定善于治理京师，善于治理民风淳朴之地的官员不一定善于治理民风剽悍之地，反之亦然。宣帝任命性格刚毅的赵广汉治理京师，“京兆政清，吏民称之不容口”；任命宽大和缓的黄霸治理地方，“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

为首”。宣帝根据官吏不同的性格来任命不同的职位，很好地做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

在综合名实的基础上，汉宣帝赏罚分明。赏有功则能让勤勉尽职之人安心，罚有罪则能让庸官懒政之人惊慌，汉宣帝认为赏罚罚罪是先贤治理天下的重要法宝，“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不能以化天下”。赏罚可以调动官吏的积极性和增强官吏的执行力，也可以引导健康的社会风气和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对于有功者，汉宣帝不吝于赏赐，如对安抚流民有功的胶东相王成，汉宣帝“其秩成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对治行优异的颍川太守黄霸，“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召信臣考课排行第一，“复数增秩赐金”。汉宣帝对于地方官吏在吸引流民、鼓励生产、改善民风等方面，给予赐金、赐爵、加俸等荣宠性奖赏。这些奖赏引领着地方官员的努力方向，增加了地方官吏的奋斗意识和荣誉意识。

而对于犯错之人，汉宣帝也不优柔寡断，“若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之属，皆称其位，然任刑罚，或抵罪诛”。精

明能干、治理有绩的京兆尹赵广汉因执法不严被“下廷尉狱”，虽然大量百姓前往皇宫求情，但最终赵广汉仍被汉宣帝判以死刑；为人敏疾的张敞治理京兆时井井有条，后因“贼杀不辜”被宣帝免为庶人；纳善听谏、考课第一的韩延寿因“放散官钱千余万”被弃市。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赏罚是为了凝聚队伍的战斗斗力，功过可以相抵则会令部分官员放松懈怠，忘记自己的职责所在。汉宣帝的赏罚分明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史称“吏称其职，民安其业”。

此外，汉宣帝还表封开国功臣，凝聚了天下民心。汉王朝的建立离不开那群抛头颅洒热血的功臣烈士，这部分人也被称为军功贵族，他们是汉朝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高祖刘邦便对每个参军人等都赐予了一份田地。到了汉宣帝时，很多功臣之后沉沦下僚，过着朝不保夕的贫困日子。汉宣帝见此，特意又赐予他们一定的田地，以便他们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复高皇帝功臣绌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祭祀，世世勿绝。其毋嗣者，复其次”。不忘前人之功，就是珍惜当下之福。官府对功臣烈士之后的嘉奖安抚了大批

仍在一线抗争的军民，巩固了百姓报效国家。

为确保法律的严明，汉宣帝设置了廷平官。路温舒上书说天下最大的害莫过于刑罚，深有感怀的宣帝就此设置了廷平官，《汉书·刑法志》曰：“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遭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刑罚关乎着百姓的身家性命，它应当是劝善惩恶、保护百姓的利器，而不该是百姓冤屈疾苦的来源之处。廷平官的职责在于审核天下案件的判决，保障法律的公平。廷平官的设置是汉代法律的一大进步，自此汉代滥施酷刑的情况大为好转。

明代状元赵秉忠说：“后世语精明者首推汉宣，彼其吏称民安，可为效矣。”赵秉忠认为历代皇帝中最精明强干的就是汉宣帝了，在汉宣帝的治理下，官吏人尽其才，百姓安居乐业。其中内在的原因，就是他重视吏治的态度和整顿朝纲的方法。



公元前409年，魏文侯命吴起向西征讨秦国，一路势如破竹，拔秦五城，使秦人不敢窥兵于西河（今黄河与洛水间）。秦君欲伐之，被人劝阻：“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遂作罢，无奈饮恨。

转眼间到了公元前225年的春汛之际，秦将王贲决堤通沟，引西北黄河水围淹魏都大梁，一片泽国中，魏王假开城投降，秦尽取魏地，设三川郡，魏国就此灭亡。

短短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秦魏攻守之势易形，魏国从战国初期第一强国到最后倾覆，令人可惜，但个中血泪之教训，实是令人深省。由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三代魏主的“国宝观”，即可知大魏何以强盛，也可知何以文侯之后国运衰颓之不可避免。

魏文侯继位后重用田子方，魏文侯的弟弟魏成在文侯面前说田子方的坏话，没想到却遭到了文侯的驳斥：“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议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国之宝也；智士也者，国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国之尊也，故国有仁人，则群臣不争，国有智士，则无四邻诸侯之患，国有博通之士，则人主尊。”文侯以“仁人为宝”，不惜为田子方怒斥其弟，体现了对人才的高度重视。正是由于文侯的这种求贤若渴、急贤近士，使得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子夏、翟璜等皆聚之于麾下，辟地四面，拓土千里，使魏国一跃成为中原霸主，笑傲诸侯。

到了魏武侯（文侯之子）时期，有一天，武侯乘舟沿着西河而下，到中游时回头对吴起说，“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国宝也！”吴起回答道，“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武侯“以山河为宝”，心胸格局已比文侯低了一个档次。实践也证明，武侯并不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连功绩赫赫的吴起也因谗言并不能受到重用，只能逃奔楚国。吴起奔楚之前，回首遥望他曾经建立了不世功业的河西之地，眼泪不禁流了下来，感叹道：“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河西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果不其然，吴起离开后不久，西河之地就被秦国吞并。

转瞬又到了魏惠王（武侯之子）时期，惠王约好跟齐威王在郊外狩猎，惠王问齐威王齐国有没有什么宝贝，并自豪地说：“寡人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志得意满之情流露无疑。没想到，齐威王回答道：“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这番以四位贤臣为宝的答复，使魏惠王听后面有惭色。魏惠王“以珠玉为宝”比之其父魏武侯又降了一个层次，难怪其数败于秦国，乃至只能割西河之地于秦以求和，也只能把国都从安邑东迁至大梁，以避免秦之兵锋。文侯以降，武侯、惠王，真可谓一代不如一代，由此亦可见大魏之国运将走向何方。

像吴起这样的人才，是可以称得上无双国士的。他们可以在君王的信任之下，凭一己之力让国家迅速强盛起来。吴起到了楚国之后，得到楚悼王的重用，立马就让楚国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让天下诸侯都畏惧楚国的强大。纵使战国史，魏、楚两国几乎全程被秦国吊打，处于被动挨揍的局面。一个吴起，却足以让攻守之势易形，让秦秦畏惧如虎，可见其能力之强悍。错失这样一个顶尖人才，无疑是魏国的重大损失。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在魏国国君一代不如一代的人才观的指引下，魏国错过了太多本因属于自己的无双国士，让他们远走他国，增强了敌人，削弱了自己，这样的魏国，不灭亡还有天理吗？

商鞅变法，使得秦国由地区性强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实力卓绝诸雄。商鞅就是因为秦国不受魏惠王的重用才到秦国的。魏国宰相公叔痤临死之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接替自己做宰相，魏惠王觉得他是病势沉重老糊涂了，根本就没把他的话当回事，连把商鞅叫过来面谈一下的兴趣都没有。要知道，商鞅就是通过和秦孝公的面谈，阐述了自己的富国强兵之略，才得到重用的。魏惠王连这点用人气度都没有的，的确也就是一个“以珠玉为宝”的人的胸襟与雅量了。孙臧，原本想投靠自己在

『国宝』与『国运』

□ 朱国峰

魏国做将军的同窗庞涓，没想到却遭到庞涓的陷害，无奈只能逃向齐国，后来帮助齐国在桂陵、马陵两次大胜魏军，斩杀庞涓，重挫魏国元气。范雎，本是魏国大夫须贾的家臣，却因为出使齐国时才华出众，受到须贾的嫉恨，须贾连同魏国宰相魏齐一起让手下用板子、荆条鞭打范雎，打得他肋折齿断。范雎原本想装死逃过一劫，没想到魏齐却派人用竹席把他一卷，直接就丢到茅坑里，又让喝醉了的宾客们往他身上撒尿，这番屈辱，实在是惨绝人寰。后来范雎逃到秦国，被秦昭襄王所重用，为其定下远交近攻的国策，屡伐魏国，魏国失地无数。八十年前，庞涓处心积虑陷害孙臧。八十年后，魏齐千方百计羞辱范雎，魏国朝堂，一直由这样变态嫉贤的人把持，魏国命运可见一斑。商鞅、范雎是战国时期顶级的政治家，吴起、孙臧是战国时期顶级的军事家，都不能为魏国所用，魏国岂能不亡？更有甚者，连信陵君这样真正有经天纬地之才的魏国宗室勋贵也不能见容于魏王，也难怪，信陵君死后十八年，君庸臣昏的魏国就灭亡了。

人们常常说魏国的地理位置不好，正所谓金角银边草肚皮，魏国处于四战之地，形势非常不利。这个说法固然有其道理，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为什么当初魏文侯能以此为根据地成为天下霸主呢？魏文侯重视人才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能够坚持正确的国际战略，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文侯在位时期，对外用兵极其慎重，只有两次，一次是向西攻秦，夺河西之地，一次是向东攻灭中山国。皆取得非凡战绩。《资治通鉴》里记载过这么一段故事：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两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文侯深知团结三晋的重要性，是故极力维持，乃至秦国不敢东进，楚国不敢北上，韩、赵甚至帮助魏国攻占了秦国的河西之地。但魏武侯、魏惠王却总想着吞并韩、赵，一统三晋，屡屡用兵，结果把自己的大后方暴露给秦、齐、楚三国，经常被他们乘虚而入。偷鸡不成蚀把米，国力不断削弱。

无论是用人问题也好，国家战略也好，都显示出文侯之后的魏国国君缺乏战略眼光，鼠目寸光，只顾蝇头小利，乃至步步败退，痛失好局。文侯时期的魏国是要强于秦国的，是当之无愧的战国霸主，但抵不住后人的昏庸无能，把偌大的家业毁于一旦。而秦国呢，自秦孝公起用商鞅变法始，奋六世之余烈，国力蒸蒸日上，最终由始皇统一字内。两国之对比，秦国一如既往坚持东进策略，广揽天下英才，接续奋斗，终成大业。魏、秦刚好就是一个反面镜像，一个高开低走，一个低开高走，魏国衰落之时，也正是秦国崛起之际。